

导 论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成熟时期，也是传统经济繁荣的时期。宋代经济发展有别于前代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是商品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研究宋代商品经济，需要全面地对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进行考察。本书选择其中一个方面——宋代商品供给作为研究论题，对宋代商品供给的基本特征以及引起宋代商品供给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一、基本概念与理论解释

（一）什么是商品

什么是商品，这是研究商品供给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作为商品的物，首先必须有使用属性或使用价值。但是物品要成为商品，除了使用价值，还要具备另一重要属性——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也就是说，一件物品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有用，能够提供某种使用价值；其次，它必须用于交换，互换物品的依据或尺度就是这个物品的交换价值，即凝聚在物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一个物可以有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

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同样，“没有一个物可以是有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①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商品的定义。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立的同时，边际主义学派经济理论兴起。边际主义学派将物品使用价值用效用这一概念来表述，认为任何物品都能满足不同人们相同或不同的效用，一件物品的效用越大，人们希望获得该物品的欲望就越强烈。效用具有递减的规律：随着人们对消费同一物品数量的增多，这一物品带给人们的满足度便不断递减。因此，为了获得更多效用的满足，人们往往愿意用对自己效用较小的物品来换取对自己效用较高的物品，物品的交换使交换双方都获得了更大效用的满足。通过交换得到的能满足人们欲望的物品就是商品。

可见，尽管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理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前者从生产出发而后者从消费入手），但对商品的界定基本一致：即物品的有用性和物品用于交换，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物品就可以称作商品。

从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简单的物物交换到现代社会大流通下进行交易的形形色色的物品，都可以称为商品，因为它们都具有商品的共同属性。不同的是，前者是商品的最初发展形式，后者则是商品的高度发展形式。对于物物交换，马克思指出：“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的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直接的产品交换形式是 x 量使用物品 A = y 量使用物品 B。在这里，A 物和 B 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②可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47、49、5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105 页。

交换是物品成为商品的必要条件。因此，交换无论是在地方性小集市、区域市场或是全国市场，甚至是世界市场进行，只要物品产权转移是通过交易行为进行的，这样的物品就可称为商品。

（二）商品供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活动分为生产和消费两部分。马歇尔指出：“人类所能生产和消费的只是效用，而不是物质本身。”^① 商品运动的实质就是从生产向消费转换。因此，商品从设计、制造、运输到销售，即商品在进入消费领域之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劳动，都可以视为生产，因为任何一个环节都对增加和实现商品效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设计、制造过程使一种物品的物理性能或用途发生变化，以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需要；运输实现了产品从低消费需求的地区向高消费需求地区的流动，增加了产品的主观效用；销售实现了产品从生产向消费转换的最终过程，是商品效用实现的决定性环节。这样一个外延扩大的“生产”概念往往容易与人们通常所指的生产活动相误解，所以马歇尔指出：“生产的这个字易于误解，通常应当避免使用或加以解释”，^② 可以用“商品供给”这一概念来代替其外延扩大的“生产”过程。

可见，从全社会来看，商品供给的过程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能将商品供给等同于商品生产，也不能将其单纯理解为提供商品的某一方面，商品供给是提供商品各环节的集合。当然，从商品供给的角度与从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某一环节的角度来研究商品经济，其视角是不同的，前者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 82 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 84 页。

研究，后者则是从商品运动流程的角度进行研究。

经济学理论对供给的研究可以从微观角度入手，研究供给过程的资源配置问题，即为了实现商品有效供给，如何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以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收益实现供给，从而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效率的增进。也可以从宏观方面入手，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所形成供给的总量变化和结构特征，以及供给变化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运行机制等问题。本书对宋代商品供给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从宏观的视角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有助于对历史发展轨迹更为清晰地把握。

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是商品经济中彼此依存、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任何一方的消长都直接影响着另一方的消长，并影响到经济的增长。本书研究宋代商品供给，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宋代的商品需求以及需求对供给的拉动作用问题，因此，本书虽然没有将宋代商品需求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研究，但在本书的具体研究中，已经将需求问题纳入了研究范畴。

一般来说，商品供求均衡也是研究商品供给和需求需要关注的问题，要认识宋代的商品供求均衡问题，需要对宋代价格变动和货币币值变动等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证和分析，那样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篇幅而使本书的重点不突出，因此，本书的研究未涉及商品供求均衡问题。

（三）经济增长理论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对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解释，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理论之一：分工论。早在 18 世纪中期，亚当·斯密（A. Smith）在《国富论》中就提出，分工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进，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1928 年阿林·杨

(A. Young) 的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将分工视为一个积累循环和自我扩张的过程，具有收益递增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博兰德 (J. Borland)、杨小凯、基姆 (S. Kim)、洛凯 (L. Locay) 等经济学家发表系列文章，指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容量，从而加速了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在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了经济体内的内生比较利益。所有这些进一步刺激分工向深度发展，从而形成积累循环的经济增长机制。

理论之二：资本积累论。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 (R. Harrod) 和多马 (E. Domar) 将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加以修正和发展，使其长期化和动态化，分别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式”，其基本方程式为： $g = s/c_0$ 。其中 g 代表产出或收入的增长率， s 代表储蓄率， c_0 代表不变资本产出率。该方程式说明了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理论之三：技术进步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最初由熊彼特 (J. Schumpeter) 提出，他认为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50年代以后，索罗 (R. Solow)、斯旺 (T. Swan)、丹尼森 (E. Denison)、卡斯 (D. Cass) 等经济学家，在认识到“哈罗德—多马模式”的假定中有致命的缺陷，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从长远看，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资本的投入 (积累) 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

然而新古典增长模式中的稳定增长是以收益递减为基本前提的，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为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 (P. Romer)、卢卡斯 (R. Lucas) 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内生技术变化的观点，形成了新增长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技术不再是外生的、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而是人类基于利己的目的而进行投资的产物。知识外溢、专业化人力资本、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会使技术进步具有收益递增的效应，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理论之四：制度创新论。这是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诸如技术进步、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制度提供了一种规则安排，激励或阻碍着人们的经济活动驱动力大小，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向，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的目标是通过规则性和秩序性，增大信息流量，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便有效地利用一国资源，获得更多的商品和劳务产出。以制度作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或抑制作用的重要因素为出发点，诺斯（D.North）、威廉姆森（O.Williamson）、科斯（R.Coase）、德鲁克（P.Deluke）、斯蒂格勒（G.Stigler）等新制度经济学系统分析了产权制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等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制度变迁规律以及实现制度创新的方法或路径。

以上所列举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以现代经济为研究对象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环境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环境大相径庭，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不能直接套用某一个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方法，如分工、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作用的理论分析，对经济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其中相当部分是建立在历史实证的基础上，如熊彼特、诺斯等人的理论），而且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确实存在着技术进步推动经济进步，制度创新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分工促进商品交换等现

象。因此，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四）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经济史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经济史，需要结合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史学研究往往注重对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即实证研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对历史现象的归纳分析，对史料的考证等等，是传统史学研究常用的方法。20世纪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理论的兴起，扩展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年鉴学派认为历史研究应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该学派明确提出“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计量史学以及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今天历史学的研究也广泛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都是从经济史的研究开始，他们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抽象演绎法，即通过逻辑分析方法或通过建立一系列经济模型来研究经济内部的各种规律和内在关系。一个模型由下列要素构成：设立假设前提，通过逻辑演绎建立有关经济变量的联系，运用实证资料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另一种是历史实证法，即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后来的新、旧制度学派所遵循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描述和说明一切经济生活现在和过去的事实；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

紧密结合，才能对经济生活作出完整的解释；经济学应该运用历史归纳法或计量统计法探索经济发展规律。

抽象演绎法具有逻辑严密、推理科学、可以证实或证伪的特点，因而所建立的模型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但是，任何模型都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之上，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和社会背景不同，不一定能符合模型中的假定条件，因此，在运用演绎分析法时需要对社会条件变动加以特别的重视。历史实证法实际上是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借鉴，但是，以归纳法为主的历史实证方法毕竟是有缺陷的，正如波普尔指出的那样，纵然是我们曾经发现亿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我们也不能肯定说“所有天鹅都必定是白色的”。对特定事物的归纳总结不一定能正确展示事物的本质。

研究经济史首先要正确认识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其次要探究这种历史经济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再次要从经济历史演变中认识和揭示经济发展规律。对于如何运用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史，吴承明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①

本书注重运用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宋代商品供给以及供给增长原因等问题。在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时，并非简单搬用其模型或原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分析问题，将历史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既充分认识宋代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的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 105 页。

差异性，又积极合理地运用理论推理和经济普遍性原理来认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问题。

二、本书的研究基础

宋代商品供给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商品供给所涉及的诸如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等内容是研究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的问题。宋代商品经济发展问题是经济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因此，学术界已有大量对宋代商品生产、产品商品化、商品流转及销售等方面或某一侧面的研究成果。说它年轻，是因为我国学者对经济史研究，其切入点一般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即研究历史变化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环节的历史变迁过程，迄今为止，鲜有人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资源配置角度入手研究。供给和需求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供给和需求在不同市场组织结构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本书以“宋代商品供给”为论题进行研究，以期从新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问题。

虽然目前尚未有完全以“商品供给”命名的研究论著，但并不意味着对宋代商品供给的研究没有展开，事实上，要形成社会有效的商品供给，需要生产、运输、销售这些环节的相互配合，对于这些环节的研究，经济史方面的专家学者们已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商品供给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状况

李埏先生在《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对不同历史时期商品

经济发展与经济曲线变化，封建地主阶级、地主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唐宋时期货币制度变革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指出唐宋是中国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一书对宋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书中不仅对宋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还考察了宋代的商业、市场发展状况，并且对封建国家、商人、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日本学者古林森广先生的《宋代产业经济史研究》，通过对宋代农畜产物加工业、金属加工业、渔业三大产业部门的生产过程及其产品流通状况进行研究，认为宋代产业出现了四个特征：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宋代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加快，剩余农产品和经济作物通过一定程度的技术加工后大量流向市场；城市手工业已经形成了具有完善管理机构和一定生产规模的手工业的生产和经营；地方特产性产业成长很快，通过市场流通，各地区的特产大量流向市场；手工业生产采用专业化生产和师傅带徒弟的技术传承制度，手工业行业组织的建立，为手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郭正忠先生的《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在对有关史实、史料详细认真考证的基础上，论证了宋代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而非“过早”和“病态”的“假象”。李晓博士的《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从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结构特征入手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宋代工商业经济在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结构性发展的态势，使封建经济制度变得更有弹性、韧劲和张力。傅筑夫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也对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在肯定宋代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了官营手工业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的抑制作用。蒙文通先生在《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一文中通过对商税的地域分布结构研究后提出，宋代商品交换主要是在广大的小市场进行，

国内不存在大规模的商品流转和发达的商业城市，因而宋代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加藤繁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则对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如禁榷制度、商税、贸易等进行考证与分析，是关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之

（二）宋代区域经济发展或产业经济发展

从区域角度研究宋代商品经济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林文勋博士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论述了宋代四川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及商品、市场、货币、商人等问题，并对四川商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做出估计；贾大泉先生的《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分析了宋代四川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程民生博士的《宋代地域经济》则从各地区的生产环境，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的地域特征，区域经济政策差异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以产业分类进行研究的成果有：（1）手工业方面，祝慈寿先生的《中国古代工业史》和季如迅先生的《中国手工业简史》是两部从史前原始手工业到清代前期工业发展进行全面梳理的通史性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变迁和发展。涉及到特定行业，郭正忠先生的《宋代盐业经济史研究》、李华瑞博士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黄纯艳博士的《宋代茶法研究》是三部专门研究宋代某一手工业发展状况的专著。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期刊和论文集，如华山的《宋代矿冶工业》，王菱菱的《宋代提点坑冶铸钱司与矿冶业》、《论宋代矿冶户》、《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陶绪的《宋代私营丝织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杨师群的《宋代官营酒务》以及葛金芳的《两宋工艺革命述论》等论文。（2）农业方面，有田野元之

助先生的《中国农业史研究》和曹贯一先生的《中国农业经济史》两部对中国农业发展进行总体研究的煌煌论著，全汉升先生的《南宋稻米的生产和运销》，包伟明博士的《宋代粮食贸易研究》方如金先生的《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梁庚尧先生的《南宋的农产品市场与价格》等是对宋代农业经济和农产品商品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茶叶的生产经营属于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由于茶是一种经济作物，其生产经营活动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学术界十分重视茶研究，相关成果颇多：孙洪升博士的《唐宋茶业经济》，台湾学者朱重圣先生的《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则是两本专门研究茶叶经济发展的著作，林文勋博士的《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论》《宋代四川茶叶产量考辨》，周荔的《宋代的茶叶生产》，华山先生的《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贾大泉先生的《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等论文也深化了对宋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三）宋代市场和流通发展

许多学者对宋代市场和商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斯波义信先生的《宋代商业史研究》和《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对宋代商业发展程度、产品的商品化和商品流程以及区域经济结构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龙登高博士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傅宗文先生的《宋代草市镇研究》，魏天安先生的《宋代行会制度史》，乔幼梅先生的《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高聪明博士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黄纯艳博士的《宋代海外贸易》与马德程先生的《宋代的商业与城市》等都是研究市场流通、市场结构与市场制度的主要论著。此外，朱瑞熙先生的《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郭正忠先生的《宋代城镇的经济结构》，李春棠先生的《宋代小市场

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等论文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宋代商业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前辈们对宋代手工业、农业、商业以及商品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为我们从事宋代商品供给论题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启迪的观点和便利的资料来源。可以说，如果离开这些前辈的研究成果，本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泉。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

宋代商品经济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论题，吸引着众多学者不断探索，同时也因为认识 and 理解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商业革命、农业革命等，商品流通范围广，市场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从农村的自给体系和小市场的交易活动出发，认为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只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从总体来看，自然经济仍然占主体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还有人认为，宋代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与实际水平之间有较大差距，官府的禁榷制度垄断了重要手工业品的贸易，政府的财政性购买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行为具有非自愿性，社会自发的商品生产所占比例很小，支付手段还很落后，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繁荣仅仅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繁荣等等。

对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探讨，商品供给是市场进行经济资源配置的具体反映，因此，当我们期待更为清晰地认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时，可以透过宋代商品供给的数量增长和供给结构变化，来认识宋代商品经济。为此，宋代商品供给的总量变化与结构特征是本书上篇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上篇分为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研究宋代手工业品和农产品

的商品供给，第二章研究宋代商品供给的基本特征，第三章对宋代商品供给进行总量分析，第四、五章是对大宗商品的供给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可以看到，从宏观上看，宋代商品供给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宋代商品供给增长很快，进行商品生产的民营手工业不断涌现，其行业分布和生产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部分官营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也进入市场交易。农业生产中剩余农产品大量涌现，商业性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2）宋代商品供给呈现多样化的品种结构特征，品种、花色、规格等方面都不断翻新。产品质量在宋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出许多质量精良的商品。替代商品和互补商品的商品供给也在不断增加，商品供给的关联性加强。商品差异化程度增强反映了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市场走向成熟。（3）商品供给总额是我们认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量化经济指标。利用商税对宋代商品供给总额进行测算和估计，宋代平均每年社会商品供给总额 7 000 多万贯，最高年份达 15 400 万贯，潜在社会商品供给总额平均每年可能达 10 000 万贯。宋代商品供给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影响商品供给周期变动的原因主要是战争和自然灾害。商品供给还具有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初级市场流向高级市场的特点，反映了农业部门在商品供给增长的重要地位。（4）粮食、茶叶、纺织品、食盐、金属加工产品是宋代市场上流通的大宗商品，这些大宗商品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品。大宗商品的构成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粮食、纺织品是政府大规模和余和买的商品，茶叶、食盐、矿冶产品是政府的禁榷商品。研究表明，宋代商品供给发展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显著的增长，而且在品种结构、大宗商品结构、供给主体结构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可以判断，宋代商品经济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已经有了较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峰。

对宋代商品供给总量和结构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宋代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但认识现象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只是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研究历史的另外一个任务是通过历史演进历程的考察来寻求规律和总结经验。因此，当从上篇的研究中认识到宋代商品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与变化之后，还需要深入探讨宋代商品供给变化的深层原因。为此，下篇着重对宋代商品供给增长的原因进行剖析。分为四章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研究宋代农业产权制度与商品供给增长的关系，第二章主要研究宋代政府采购制度和禁榷制度对商品供给的影响，第三章、第四章主要研究分工发展、技术进步与手工业商品供给增长的关系。促进宋代商品供给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农业产权制度安排，刺激了宋代农业效率的提高。自唐朝中期开始改革，在宋代完全定型成熟的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且对土地生产经营者产生了向市场提供更多剩余农产品和进行商业性农业生产的激励效应，对促进宋代农产品的商品供给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对宋代普遍实行分成租佃制的经济效率分析和对小农的供给行为的分析，也证明了宋代农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是有效率的，且十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次，宋代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和对重要手工业产品实行禁榷的制度，对宋代商品供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宋代的大宗商品都与政府有密切关系，政府大规模的采购制度，使农户的剩余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剩余产品便捷地转化为商品，甚至在政府带有强制性“和买”之下，农户的部分必要产品也转化为商品；政府对重要手工业实行禁榷制度，并用行政手段强迫生产和进行销售抑配，利用政府遍及全国各地的行政网络进行销售，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禁榷商品供给能力和经营收益符合国家利益要求；此外有条件地利用商人参与禁榷商品的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禁榷制度的弊病。第三，在宋代手工业商品供

给增长中，分工的作用不可忽视。宋代手工业已经形成了类别齐全、能满足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手工业行业社会分工十分细化，但生产过程的专业分工并不明显，手工业分工的发展对手工商品的增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商品品种类别的扩大而不是商品数量的增长上。第四，影响宋代手工业供给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供给增长的作用。宋代手工业技术不仅有新发明被运用于生产，而且大多数传统手工业技术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各种新技术发明和改良技术都有效地得到了传播和扩散。这些技术创新活动，降低了边际劳动成本，提高了宋代手工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手工业商品供给的增长。

通过对宋代商品供给的探讨，可以认为，宋代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发展。但也要看到，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部门支配下的一元经济基础上，一元经济有利于回归自然经济而不利于打破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最大的消费主体和产品商品化中介支撑了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从而造成了表面上商品经济发展很高而实质上市场化进程很低的现象。它们既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品经济的深化发展，使商品经济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破传统封建经济的枷锁。这就是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进程滞后的原因所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进程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有很好启示，这就是既要看到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政府的作用，应重视市场的培育和促进私人投资，才能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础。

上 篇

宋代商品供给总量变化 与结构特征研究